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主编 辽海出版社

经济卷

陈桦著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Y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主编 辽海出版社

K249.07/10

经济卷

陈桦著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卷/戴逸主编;陈桦著.
-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12
ISBN 7-80638-383-2

I.18… II.①戴… ②陈… III.①经济史-世界-18 世纪
②经济史-中国-18 世纪 IV.K1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0677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海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21 千字 印张:10 插页:5
印数:1—2 000 册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虹

责任校对:陈文本 侯俊华

封面设计:杜凤宝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26.30 元



作者 陈 桦

作者简介

陈 桦 1956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9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从事清代及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近年主要著作有《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清史编年·道光卷》。

绪 言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经 济 卷

不论对于整个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来讲，18 世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在这 100 年间，世界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并且开始了意义深远的工业革命。而在中国，封建经济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都已得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以及当今史学家们的充分肯定和赞许。

同历史上任何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一样，中国 18 世纪经济具备着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和基础。

自 17 世纪 40 年代入关之后，清政府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采取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措施，巩固了诞生于连绵战火之中的封建政权。在此基础上，清政府针对战后土地严重荒芜、人口大量流亡的状况，实行了减轻赋税、招民垦荒等措施，迅速地恢复生产，使社会经济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

这些政策成效显著，到 17 世纪末，中国腹地因战乱而造成的荒地，不仅已经基本垦复，而且耕地面积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人口数量大幅度回升，以至封建统治者开始感到人口的压力。包括农业、工商业在内的社会生产，也顺利地渡

过了复苏阶段，进入起飞发展时期。政治局面的稳定与经济生活的良性循环，为以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 18 世纪的经济成就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口的猛增。严格地讲，人口的数量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最佳指标，人口的多与寡，并不总是同社会生产水平相一致。但是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由于生产技术的低下，以及人们物质生活的不富裕，一个社会的经济能力，完全可以通过它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来反映。当跨入 18 世纪时，据估计，中国的人口在一亿二千万左右，而 100 年之后，则达到了 3 亿，增加了近两倍。如此迅猛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及世界历史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第二，耕地面积的扩大。整个 18 世纪，清朝统治者都在致力于增加农业种植面积。由于 17 世纪末全国腹地的荒地已经基本垦复，所以这时扩大耕地的努力主要集中于对内地零星土地的开垦，以及边疆的开发。清政府通过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人们利用河滩地、山坡地、房前屋后的余地等不成块土地耕获粮食。同时以西北的新疆为重点，用移民、屯田等方式，开发土地，扩大种植面积，发展当地农业。这些卓有成效的措施，不仅使 19 世纪初全国的耕地面积远远超过了明末水平，而且很有可能已经突破了 10 亿亩。在以农业为第一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土地利用、开发的程度，是衡量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

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在 18 世纪社会也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最明显的变化是市镇的大量出现。以经济功能为主要职能，在建置规模上小于州、县治所

所在地，而又大于一般自然村镇的市镇，虽然明代时一些地区就已存在，但进入 18 世纪后，其发展规模已迥然不同。不仅市镇的数量猛增，而且它的地域分布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商品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市镇密度增大，除陆路交通干道、江河汉口等重要运输线路上，在那些主要的粮食、经济作物产地，手工业品生产地，也都出现了市镇。它们星罗棋布，互相联系，互相呼应，交换各自所需，形成为日趋扩大的市镇经济网络。在商品经济次发达的地区，诸如华北，市镇的数量和规模也在增加。甚至西北、西南等较落后之地，也出现了数量不等的市镇。市镇经济职能的专业分工，也是当时令人瞩目的变化。根据市镇所在地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出现了作为粮食集散地的市镇，生产棉织品的市镇，丝绸市镇，商业市镇等。这种专业化的分工，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反过来又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18 世纪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区域间商业网的建立和形成。地区间的封闭状态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可以说，经过 18 世纪一个世纪的发展，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以解决粮食供需矛盾为契机而日益频繁的地区间粮食流通，使得全国各地粮食市场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粮食从生产地到集散地，由集散地到区域性粮食市场，以至运送到缺粮地区，都已形成固定的路线。不同的地区，根据其生产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一般都具备了比较固定的粮食市场。而区域间粮食市场及运输网络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各地土特产、手工业产品及其原料，沿着粮食运输路线，源源不断送往各地，增进了地区间经济往来。

不平衡性是 18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突出特点。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民族风俗、社会生活以及历史传统的差异，特别是封建经济的地区封闭性，导致社会经济不平衡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就生产布局而言，当时出现了农业区、牧业区、农牧混合区。每个经济区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也参差不齐，大体上形成东高西低的局面。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人口稠密、商品经济活跃区，成为当时全国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而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区，人口稀疏，农业技术落后，处于这一经济发展阶梯的底层。如果从各地间经济联系的角度考察，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很强的区域性色彩。以河流和重要陆路交通为纽带，地区间商品的互补性为基础，在当时的社会中构成了几个大的经济区域。在每一个大经济区域内，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赖，可以视之为一个经济整体。应该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但是到了 18 世纪，地区间的生产能力和技术状况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社会经济的区域性色彩也更加浓厚。这种不平衡的特点和经济格局一直影响到今天社会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个方面。18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不足与局限，带着鲜明的时代标记。首先，这 100 年时间里，尽管生产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通过改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而是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劳动力，即通过简单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实现的。因而这种状况下的生产能力的提高，缺乏坚实的基础，后劲不足，它在

快速地增长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必然地要逐步放慢速度，以致最终停滞下来。其次，在产业结构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18世纪社会工业的发展不得不仍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商业也不可能进入近代商业领域。而且就工商业发展的规模而言，也远未超出旧有的范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它们与农业相比，所占比例仍微不足道。其结果，一方面，使得工商业无法发挥其在现代社会所起到的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无法有效地吸收部分农业地区出现的相对过剩人口，实现剩余劳动在生产部门间的转移。再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处于萌芽状态，成长缓慢。这种在明末就已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在18世纪，由于现行社会制度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没有多少发展，它仍然像一座处于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孤岛。由此也就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经济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

如果与同时代正在进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比较，这种局限性就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经济在18世纪虽然还只存在于极其狭小的区域内，但其先进性与生气勃勃的活力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并成功地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英国，18世纪时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生产技术的革新，机器的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获得了实质性的飞跃。

在棉纺织业，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纱机，即著名的“珍妮机”，该机可同时带动十余个纱锭。其后又相继出现了水力纺纱机及骡机。骡机可一次转动三四百个纱锭。机器的应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在动力机器方面，1782年，瓦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和制作出完全可以在工业中应用的蒸汽机，因而首次解决了

机器工业中的动力问题。恩格斯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 18 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① 在冶金方面，18 世纪 30 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 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以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18 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开始腾飞的年代。据统计，1776 年至 1800 年棉纺织品出口从 670 万英磅增加到 4 143 万英磅，24 年间增长 5.18 倍。毛织品在 1788 年生产 7.5 万匹，1817 年则达到 49 万匹，增长 5.53 倍。煤的年产量，1700 年为 500 万吨，1795 年增至 1 000 万吨，增长 1 倍。生铁产量，1740 年仅为 17 350 吨，1806 年则猛增至 258 000 吨，增长 13.87 倍^②。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兰开夏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 世纪 70 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 1/2，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英国的经济奇迹，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世界的飞速发展。

18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讲是封建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其时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经济领域。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的清政府，则通过实行一系列措施，以维护封建制度及其经济基础，特别是闭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00 页，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② 参见王荣堂等：《新编世界近代史》，上册，第 153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关锁国、限制工商业、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因此，虽然中国 18 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给予中国社会发展以突出贡献，但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其在沉重的封建主义桎梏之下，步履蹒跚，矛盾重重，仍未脱出旧生产模式的现状，并且隐含着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

目 录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经济卷

绪 言	(1)
第一章 18 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	(1)
第一节 缓慢发展的农业	(1)
第二节 传统的手工业生产	(13)
第三节 商业与城镇经济的活跃	(23)
第二章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4)
第一节 封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34)
第二节 区域性经济的形成与特点	(46)
第三节 清代社会经济格局	(50)
第三章 18 世纪中国的经济区域 及其特征 (上)	(63)
第一节 东北经济区	(63)
一 辽沈地区	(66)
二 吉黑地区	(69)
三 西部地区	(71)

第二节	华北经济区	(77)
第三节	华中经济区	(95)
第四节	华南经济区	(112)
一	福建地区	(113)
二	台湾岛	(116)
三	海南岛	(123)
四	广东及广西东部地区	(124)
第四章	18世纪中国的经济区域及其特征(下)	(129)
第一节	蒙古经济区	(129)
第二节	西北经济区	(143)
第三节	西南经济区	(164)
第四节	青藏经济区	(183)
第五章	18世纪中国的国家财政	(193)
第一节	封建财政体制与政策	(194)
第二节	岁入	(209)
第三节	支出	(216)
第四节	赋税制度改革	(222)
第六章	非常项经费的支出与筹措	(232)
第一节	巨额的非常项经费支出	(232)
一	蠲免与灾赈	(233)
二	战争费用	(240)
三	河工及其他	(242)
第二节	捐纳与捐输	(246)

一 捐监	(247)
二 事例捐	(250)
三 捐输仓贮	(252)
四 商人报效	(254)
第三节 关税与盐税	(256)
第四节 生息银及其他	(268)
第七章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272)
第一节 地方存留	(274)
第二节 火耗归公	(283)
第三节 严查亏空	(289)
第四节 协饷制度	(295)
参考书目	(301)

第一章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经济卷

18 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

第一节 缓慢发展的农业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同时也是惟一对社会经济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因此，农业生产状况往往成为人们判别封建社会经济水准的重要尺度。

中国 18 世纪农业的显著特点是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清朝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土地的开垦。清初，为迅速复种因战乱而抛荒的土地，在全国大力推行了诸如招民垦荒，减免赋税等措施，致使像四川这样抛荒相当严重的地区，也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开垦出大片荒地。当内地大面积荒芜土地已被垦复，耕地呈基本饱和状态的时候，清政府又适时地开始了对边疆省份的开发。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通过兵屯、民屯、回屯、犯屯等多种形式，开发当地土地资源。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则实施了意义深远的“改土归流”措施，消除土司制度，促进经济发展。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

自发地掀起了移垦边疆的高潮。他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纷纷涌向东北、蒙古、西北、台湾，以及西南的云贵等地旷人稀地区，落脚生根，从事农业生产。在开发边疆的同时，清政府仍然十分重视对内地土地的进一步开垦，颁布实行了有关对垦复零星土地免征或减征赋税的政策。

由此，清代全国耕地面积，除去受战争影响的个别时期之外，始终都在不断增加。这在清政府所掌握的纳赋土地中，被直观地反映出来。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共有在册耕地 6 亿亩。雍正二年（1724年），增加至 7.23 亿亩。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纳赋土地有 7.35 亿亩。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则接近 8 亿亩，为 7.91 亿亩。75 年后，光绪十三年（1887年），全国在册耕地总数达到了 9.11 亿亩^①。

事实上，实际存在的农用耕地数量，要远远超过此数。因为，官方出于征收赋税目的所进行的土地统计，不仅无法反映人们为逃避赋税而隐瞒不报的那部分土地，而且也忽略了各地普遍存在着的“折亩”现象，而这两类土地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估计 18 世纪末全国耕地面积约 10.5 亿亩，这不能不认为是农业生产的巨大进步。

高产农作物品种的推广，在 18 世纪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水稻的种植，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水稻的食用价值高，口感好，而且一年可以收获二季，甚至三季，因此土地利用率高，单位面积产量相当可观，为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理想农作物品种。不过，水稻的生长对自然环境

^① 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 38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条件有诸多要求，需要充足的水源和一定的气候条件，所以它的种植一般都局限于长江以南地区。到了清代，情况发生变化，水稻的栽培渡过淮河，被引种于北方，并在水利和土壤条件较好的地方，得到较迅速的推广。康熙皇帝很早就在北京的玉泉山，专辟水田，试种南方引进的水稻。雍正年间，又于京畿一带进行营田，兴修水利，整建稻田。由此，华北地区开始了较大面积的稻田作业。另外，东北也在发展水稻的种植。辽沈地区农耕条件较好，土壤肥沃，水源丰富，气温相对较高，随着中原农民不断向关外的移迁，辽河流域逐渐出现了一些稻作区，到清末，水稻已成为辽南地区重要的农作物品种。在素以干旱著称的西北，清代也出现了水稻。清政府自乾隆二十年（1755 年）以后，在北疆开展的大规模屯田，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稻田。南疆自然条件优于北疆，当地水稻的种植，在地方材料中有颇多记载。不过从整体讲，清代淮河以北地区水稻的种植，还仅处于刚刚开始阶段，不论是耕种面积，还是粮食产量，在整个农业生产中都还只占极其微小的比重。但其意义却非常深远，它为近现代北方水稻种植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玉米作为一种高产作物，在清代，其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玉米的优点，不仅仅在于产量高，更重要的是它对土壤和水利的条件要求不高，耐旱抗涝，几乎无处不可以种植。包世臣的《齐民四术》对玉米做了这样的描述：“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宜勤锄，不须厚烘，旱甚亦宜溉。米舂为饭，亚于麦，惟不耐饥，可炒食，磨粉为饼，味黏涩，收成至盛，工本轻，为旱种之最。”玉米唯一的缺点是食用价值稍差，口感不太好。

由于玉米适应性强，所以它最先在山区得到大面积推